

## 服务是最好的社区治理

一段时间以来,有关城市治理的话题备受关注。从城市外来人群的居住问题,到适龄儿童的托幼问题,无不是老百姓关心的焦点。这在某种程度上说明,社会治理的重心正在下沉,社区治理在发现问题、解决问题上的作用不容忽视。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也需要在城乡社区治理上落细落小落实。

社区是社会结构中的基本单位和有机组成部分。社区治理的好坏,关乎社会治理的效果。从目前来看,社会建设、社区治理和公共服务存在一类现象,即治理所需的人财物、权责利等资源“横向不到边,纵向到底”。“横向不到边”意味着在资源配置和调配过程中,各职能部门之间及参与主体之间各自为政,缺乏整体协调,治理和服务的成本高、效率低;“纵向到底”意味着各种资源遭遇纵向截留,无法顺畅地输送到基层社区,治理和服务无法真正惠及群众。“一横一纵”让治理效果打了折扣,需要加强统筹协调,重心下移,让资源在流动中实现最大化。

社区治理,一个关键因素在于基层党组织。社区怎么建设?群众如何服务?矛盾怎么化解?面对这些问题,一个松软涣散的基层党组织往往能拖就拖、能遮就遮,而一个坚强有力的党组织就像吸铁石一样把群众紧紧地凝聚在一起。我们在调研时也发现,协调好“一横一纵”的关系,党建重心要向下并推动基层区域化建设,一方面强化基层党组织的横向统筹协调功能,另一方面健全市、区、街道、社区等四级党组织联动体系,形成“横向到边,纵向到底”的社区治理和服务网络。

在实地调研中,我们以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为样本进行了跟踪分析。作为主城区,杏花岭区的市政变化很大,老旧小区的对比鲜明,居住环境和社区服务的差异比较明显。如何让新社区居民更舒适?如何让老小区群众“不落伍”?杏花岭区搭建了党群服务中心的平台,依托区域化党建互联互通机制和市区街道社区四级联动机制,整合了多方资源。例如,为了调动党员的服务热情,专门设立党务功能区,让多年与党组织失去联系的离退休老党员和无组织党员找到了“家”,进而引导党员走进群众;又如,为了让群众更便利,社区划出便民服务功能区,基本涵盖了健身、卫生、就业、创业、居家养老、助残等项目。这也契合了“社区建设光靠钱不行,要与邻为善、以邻为伴”的理念。

“服务是最好的治理。”但是社区服务不能千篇一律,应该讲实情、有特色。以杏花岭区下辖的三个街道为例,杏花岭街道的单位众多,就以党建联席会议制度带动服务提升;敦化坊街道的大型国企居多,就利用党员“工作在单位、活动在社区、奉献双岗位”的机制,推动党员志愿服务;三桥街道的非公企业和社会组织发达,就发动社会力量参与社区工作。不同社区街道,要把自身特色彰显出来,有的放矢地治理,从而盘活本地资源,让服务供给多元化。

习近平总书记指出,“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,发挥社会组织作用,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、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”。城乡社区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家园,也是党和国家政策措施落实的“最后一公里”。让资源下来、服务上去,群众满意,应是社区治理的题中应有之义。如此,矛盾才能少一些,生活也才能更美好。

## 年终述职不妨也说说“缺点”

储旭东

年终述职,就是要求党员干部对全年的工作做一个梳理,谈一谈在干事创业、担当作为、尽责履职中的得与失,在成绩中总结经验、在缺陷中反思问题,一切都是为了给自己全年工作一个中肯的评价,也对下年度工作打好基础,树立更高的起点。如此说来,即便存在短板、发现不足,只要能得到宝贵的建议,让自己不断完善,就算拿出来说说又何妨?

“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。”每个人有长处、强项,自然也会有短板和盲点,何况我们从事一项工作都有从陌生到熟悉、由熟练到生巧的必经过程,而这段期间,每一次自我总结,每一句他人建议都显得弥足珍贵。尤其对不少同志而言,如此省视不足,提升自我的机会,一年也就几次,甚至更少,若是不当回事,表表功绩、唱唱高调、走走过场,就枉费了党组织的一番“良苦用心”,着实要不得。

时下,年终述职之表功、不言过的现象始终存在,甚至在不少党组织中已然成为“潜规则”“作风病”。有的干部述职,把成绩变着花样反复说,就是不肯找出自身问题,惧怕问题一旦被揭露,面临考核“挂彩”,绩效“泡汤”的窘境。有的干部出于对领导的“敬重”,对同事的“包容”,满嘴好言蜜语,即便明白问题所在,也依旧三缄其口,佯装“听不见”,甚至昧着良心叫好点赞。有的干部尽管对问题进行剖析、对难点进行梳理,结果一上会,发现一片“大好山河”景象,无奈之余,把一肚子苦水和心里话硬生生给“咽下去”。

如果说,年终述职单纯为了说说成绩,何须兴师动众开个大会,还不如拉条横幅、贴个海报的作用来得明显。文过饰非、美化问题,看似“这边风景独好”,实则自欺欺人罢了。党员干部必须摆正心态,用“眼里揉不得沙子”的态度对待缺陷和不足,用好年终述职“武器”,把握自我完善、自我革新、自我提高的机会,有问题就拿出来“晒晒太阳”,及时“排排毒”“祛祛病”,根除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的一切杂质。同样的,各级党组织也当加强年终述职的氛围营造,重申纪律要求、明确述职标准、从严监督管理,让年终述职充分发挥突出问题、分析问题、改正问题的功能,坚决与形式主义、官僚主义作斗争,杜绝一切浮于表面、流于形式的“伪述职”“乱述职”,让年终述职回归务实、追求实效。

年终述职,不妨也说说“缺点”。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是共产党人一以贯之的好传统、好习惯,我们只有做到直面问题缺陷、敢于接受批评,才能让我们党更加“身强力壮”,健康成长,永葆青春活力。

## 法治与德治何以相得益彰

陈先达

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,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一个鲜明特点。二者分别用“依”和“以”,用语准确,不能换位。

历史上,儒家主张以德治国,但其本质是依德治国。依德治国要求性善,儒家倡导性善,但这只是一种贯彻自己学说的立论而已。因此,我们不能依德治国。依法治国也不能换成以法治国。如果以法治国,法就可能蜕变为统治工具,统治者自己则置身法外;依法治国,意味着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,都得遵守法律。我国封建社会有丰富的法律文化和诸多法律,如秦律、汉律、唐律等,可以取其精华、加以借鉴,但封建社会不是法治社会,因为其法律只是用来统治老百姓的。

在封建社会,非圣则非法。所谓以孝治天下就是以道德为法,不孝是会受到严惩的。曹操诛建安名士孔融,罪名就是“不孝”。可见,依德治国的标准难以厘定,因为道德以价值为圭臬,具有较强的相对主义色彩。这说明,治国必须依法,做到有法可依,建设

法治国家和法治社会。

道德与法律是有界限的。道德重在化民、教民,有道德的人会自觉尊法守法。个人主义者或利己主义者容易突破道德底线做违法的事,但有个人主义或利己主义思想并不违法。法律要论迹,提供犯罪事实;道德要论心,提倡慎独慎微。我们应当用道德教化民众,用法律厘定罪与非罪的界限。只有这样,才能从道德与法律两方面治理好国家和社会。

在现实生活中,道德要求往往高于法律规定。比如,法律没有规定不孝敬父母是犯罪,但子女不赡养父母可以通过法律来解决。孝不只是赡养和义务,而且是敬,是一种对父母的敬爱之情。只依法交赡养费而不敬爱,不能算孝。正如孔子所说,“今之孝者,是谓能养。至于犬马皆能有养,不敬,何以别乎?”我们不能用法律条款反对道德教化,也不能用道德观念绑架法律。法律是现实的,其判决可以通过强

力机关执行;道德观念则是一种理想、一种价值观、一种做人的标准。就社会功能而言,道德不同于法律。法律主要是事后处理或惩罚,而道德教育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自觉。有道德的人,不是由于害怕法律惩罚而不犯法,而是由于道德内化为良心自觉而遵守法律。道德不是威慑力量,而是教化力量。可以说,道德是一种自觉行为,甚至是一种勇气。见义勇为、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,这些行为都是道义力量使然,而不是法律条款的规定。

在社会主义社会,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可以形成强大合力,释放强大正能量。争论哪个更重要,实在没有必要。从道德角度说,我们提倡国家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,这种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并不违反法律中有关个人权利保障的条款。维护个人合法权利属于法律范畴,为了集体利益而牺牲个人权利并非法律规定,属于道德范畴,它们都是社会主义社会所必要的。相反,如果将依法治国和

以德治国对立起来,则是有害的。例如,认为提倡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就是不尊重个人权利,以私权神圣为由反对提倡集体主义、爱国主义,这样的论断和做法都是错误的,其实质是混淆了法律和道德的不同功能。

道德规范不能脱离时代和社会制度。在社会主义条件下,为树立正确价值观,出于国家稳定和社会和谐的考虑,在对公众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时,有分析地强调责任优先于权利等道理是正确的。相反,将权利置于责任之上、将自由置于国家安定团结之上、将个人置于集体之上,在实践中会带来许多危害。我们不能用法律规定来反对道德教化,不能简单认为凡是法律不禁止的都是可以做的。法律不可能无所不包,规定人的全部行为。我们需要的既是法治社会,又是具有高尚道德的社会。社会主义法律应当维护个人权利,社会主义道德应当倡导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、提倡无私奉献。这就是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的辩证思维。



## 让“临时工”背锅也是官僚主义

张 瑞

不久前,吉林省吉林市出现了一起政务大厅因“懒政”问题遭记者暗访,官方回应中却强调是“临时工”所为的新闻。尽管该事件在受到舆论关注后有了及时有力的整顿,但这些年每每出现类似官方回应,舆论总是很不“买账”:为什么出事的总是“临时工”?

曾几何时,“临时工”只是个关乎内部身份的称谓,并没有多少社会公众关心。可是这几年一些地方政府的“临时工”却频频被“出镜”,各种新闻一旦出现“临时工”,往往引起舆论关注。

其实,许多关于“临时工”的官方回应并非是事实,但之所以会出现南辕北辙的舆论效果,问题的根子在于“临时工”根本就不应该成为政府回应工作失误的理由。

身份虽“临时”,可责任义务不“临时”,用内部的身份来推诿外部的责任,这无异于自相矛盾。“临时工”的存

在原本只是政府内部的人事安排,在一个单位里面或许泾渭分明,然而一旦他们走上街头协助执法,或是坐在政务大厅里办公,在与之打交道的普通老百姓看来,有没有编制又有什么分别?在政府内部当然可以因编制不同而有不同的管理,然而政府的对外形象是统一的,公众也不可能迁就行政机关的所谓内部逻辑,内外有别的混淆必然带来官民关系上的拧巴。

这一层道理许多地方未必不明白,然而总还有地方拿“临时工”说事,这背后是官僚主义心理在作祟。首先,因为“临时工”不是正式公务员,就觉得“出了事”是个人问题,“已开除”等于是解决问题,这种捏软柿子式的敷衍,不过是推诿塞责的又一种表现;再者,捅开脓包就要流出脓,用“大事化小、小事化了”来捂住盖子、保住乌纱,这套自欺欺人的办法实际上掩盖了部门的管理、作风问题。

我们还必须意识到,现实中的“临时工”其实早已不“临时”。如今各地政府都在大量聘用编外的“临时工”来承担部分行政工作。这一方面由于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,社会管理中的事务愈发繁重,另一方面也因为存在“有编制的不干活,临时工在一线”的人浮于事的乱象。因此面对这样的形势,“临时工”管理上若有缺失,决不能只看成是无关痛痒的疥癣之疾,特别是基层政府必须予以正视。

由此看来,官方回应里的“临时工”非但不是挡箭牌,而是反映政风问题的放大镜,每一次对“临时工”的质疑,公众期待的都是作风的提升、管理的完善,任何偏离这一期待的回应和处理,最终不仅难以得到公众的谅解,反而会损害政府的公信力。官方回应就不应纠结于所谓编制、身份,希望未来多见一些自我担当和整顿实招,而不再去指责所谓的“临时工”。

## 补短板与虑长远

桂从路

“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”“抓重点、补短板、强弱项”“坚持去产能、去库存、去杠杆、降成本、补短板”……在十九大报告中,“补短板”被着重强调,内蕴殷忧之意。那么,如何补短板?从实践看,树立长远思维很紧要。

刚刚过去的一年,从“慧眼”卫星遨游太空到C919大型客机飞上蓝天,从量子计算机研制成功到海水稻进行测产,从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到“海翼”号深海滑翔机完成深海观测……这些耀眼的科技创新成果令人振奋,却绝非一时之功,显然离不开国家一系列重大科技计划的长期布局,离不开科技工作者对基础科学的长期研究。没有长远思维、战略视野,我们很难办成一系列大事,解决一系列难事。

在发展的进程中,无论是教育、就业、收入等方面的操心事、烦心事,还是脱贫攻坚中难啃的“硬骨头”,都堪称影响人民获得感、幸福感、安全感的短板;无论是经济结构转型升级,还是生态文明建设、生态环境治理,都存在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。面对那些事关全局性、长期性、基础性、根本性的问题,我们既要有“一万年太久,只争朝夕”的紧迫感,又要要有“一锤接着一锤敲”的钉钉子精神,把长远思维贯穿到“补短板”工作中去。

长远思维,首先就意味着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的高站位。不被暂时的困难所吓倒,不被眼前利益所遮蔽,站得高才能望得远。2008年,贵州省提出高起点规划公路网,10年内实现县县通高速。有人质疑,贵州是穷省,花这么多钱修路值不值?选择算长远账的贵州,如今已成为西部第一个实现县县通高速的省份,为脱贫致富打下了坚实基础。同样位于西部的青海省,放弃走传统工业化的老路,选择把生态保护放在第一位,通过环境改善激活生态红利,让生态美成为跨越式发展的最大资本。实践表明,立足长远的投入,也许效应不会立竿见影,却能厚植发展的根基。

长远思维,也意味着“不谋全局者,不足谋一域”的宽视野。如果总是只紧盯一点、不顾其他,就容易陷入补了东墙堵西墙的困境。有的地方搞精准扶贫,便将各种政策、资金、重点项目一股脑倾斜到贫困县、贫困村,而那些非贫困县、非贫困村的工作则被置之边缘,导致部分群众出现返贫现象,影响脱贫攻坚的整体进程。眼里只有某一领域的当下与长远,而没有从全局、整体去考虑,显然也是行不通的。从全局出发,充分考虑不同群体的诉求、更好兼顾各方的利益,才能统筹兼顾各项事业的发展,真正将短板补齐补牢。

长远思维,还应有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大胸襟。很多时候,补短板难以毕其功于一役,必须尊重客观规律,葆有“时间的耐心”。一些地方在补短板过程中,并非看不清长远利益,而是贪一时之功、图一时之名,对容易从数字上反映出来的,能够吹糠见米的成绩十分用力,对打基础、管长远的项目不感兴趣。结果,眼下成绩好看,对未来发展却毫无助益。提高觉悟、重视潜绩,不驰于空想、不骛于虚声,一茬接着一茬干,才有利于从根本上补足短板。

今天,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时间节点日益临近,补短板的任务愈发艰巨。摒弃急功近利的思维,砥砺埋头苦干的精气神,在“虑长远”中“补短板”,我们就不仅能走得稳,更能走得远。

(紧接第一版)成功举办了首届“漕运杯”全国邱心如女性散文大奖赛,有力宣传了淮安的历史文化。博里农民画家潘宇第三次荣获全国大赛金奖,1200多幅作品参加国内外绘画展览和国际文化交流。

我区还先后设立了全国性“袁鹰文学奖”、“吴承恩长篇小说奖”,并先后被授予“中国民间文化艺术之乡”、“中国书法之乡”、“中国杂技之乡”称号;小戏、小品及书画摄影作品获江苏省五星工程奖6项,其中,50余件作品获省级以上书画摄影作品奖,创作的文艺作品达20余部、舞台艺术作品8部;全区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开展文艺培训百余次,培训文艺骨干近千人,各类文化团队达到40支,总人数1500人……

在区文广新局的牵头下,先后举办“淮安区2017‘文化和自然遗产日’暨历史文化名城30年保护成果大型图片展”,全区首届金牌讲解员大赛等活动,受到社会各界一致好评。同时,深入推进全民阅读活动,每月23日图书馆流动日活动,累计开展图书“四进”活动8场次;送电影3141场、送文艺演出100场、送展览5场、送图书11040册。

文化建设加快

文化设施反映了一个地区的经济文化水平,代表着城市的现代文明和建设成就,是城市整体形象的一部分。近年来,我区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积极进展,初步彰显了我区独特的魅力。

加快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项目建设。恩来文化广场建设进入2017年度省PPP项目库,去年底已经启动建设。区文化馆获批国家一级馆;完成了60个行政村综合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和4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建设;区图书馆创成省级古籍收藏单位,建成中国漕运博物馆游客接待中心、百姓影院等一批公共文化服务设施。建成数字电影固定放映点110个,图书分馆13家。建成数字农家书屋86家,配送农家书屋电脑146台。

我区扎实推进江苏省文物安全综合管理实验区建设,建成全国首家县区文化综合监管平台,被列入省委省政府改革30项重点工作之一。秦淮故居二期、蝴蝶厅、末口遗址环境整治完成方案论证评审,有序推进保护;启动青莲岗遗址试掘工作,出土了10余件石斧、石凿、数十件陶器,鼎、杯、纺织轮、兽皮打磨器以及彩绘陶片等,还发现了一处房基遗迹。积极开展国家级非遗项目“楚州十番锣鼓”数字化保护工作,并在央视10套《文明密码》播放。淮安茶馓制作技艺、“钦

工肉圆制作技艺”,入选“长三角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技艺展”,“博里农民画”项目入选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美术、传统技艺展。

## 文化生活异彩纷呈

每年春节期间,区宣传文化部门都会组织开展了“送戏文艺村村到”活动,如“迎新春淮剧进农家”“过大年看大戏”、“廉政文化乡村行”、“法制文化乡村行”等形式将淮剧、歌舞、小戏小品等一大批老百姓喜闻乐见的节目带到村庄田头,农家小院给广大父老乡亲们送去最优质的精神食粮。每年的“双服务”活动,淮剧二团累计演出在230余场次。观众平均每场次达到六七百人以上,多时则达三四千人。

不仅仅是春节,在平时,走在淮安区,随处可见到“文化淮安”的魅力:每天下午,周恩来纪念馆前和镇淮楼下的文化长廊里,娱乐的人群把这里挤得水泄不通,有唱歌的、拉二胡的,练大合唱的、下象棋的,乐声、歌声、笑声,交相辉映,这里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;去年初正式开放的萧湖公园内,白天人头攒动,晚上流光溢彩。

我区群众文化活动历来活跃,拥有杂

技、民歌、剪纸、农民画等一批特色文化乡镇。另外,泾口高跷、流均舞狮、平桥舞龙、席桥花船、季桥诗歌、博里诗词等一批乡镇特色文化项目异彩纷呈。

“一乡一品”工程的推进,使得我区群众文化逐步构建起有龙头、镇有特色、村(居)有亮点的文化发展格局。曾绝迹了半个世纪的民间古曲——“十番锣鼓”,被重新发掘整理编排出《金盘捞月》《咏花》等一批古曲曲目,通过多次公演吸引了数以万计的观众。富有白马湖畔水乡韵味的民歌对唱、赛唱,融民间踩高跷技术和现代舞蹈手法于一体的泾口“高跷舞”表演等都已成为城乡群众喜闻乐见的“文化大餐”,为老百姓营造了有认同感、归属感的精神家园。

去年九月,在省农委书屋工作会议上,我区被评为农委书屋提升工程试点先进单位。近年来,我区通过鼓励乡镇自筹、区级支持、上级奖补的方式,筹集建设经费,仅2017年就投入资金170余万元,配送电脑148台,配送图书5万余册,建设农委书屋307家,实现村级全覆盖。全区目前已建成图书分馆15家,40家农委书屋与区图书馆实现通借通还,建设数字农委书屋148家,加强农委书屋信息化、规范化、常态化管理,带动全区农委书屋全面提档升级。